

第三章 台灣經濟發展之理論分析

台灣經濟發展目前是處於一個國際競爭激烈的局勢當中，如何繼 1980 年代創造台灣經濟奇蹟之後，再接再厲，迎頭追擊具全球競爭力的強國。再這之前，我們必須了解 1980 年代的台灣為何會創造出如此的經濟奇蹟，也惟有探就發展理論的精髓，方能達其事半功倍之效。接下來，本論文將探討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與雁行形態發展模式，並以台灣自 1950 年代以來的發展軌跡探索台灣經驗發展的蹤影，試圖詮釋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與雁行形態發展模式的概念，並為 21 世紀台灣經濟發展建構其思考基礎。

第一節 現代化理論與台灣發展經驗

現代化理論認為台灣從戰後一片廢墟的低度開發國家，發展成現代已開發國家之原因，乃是因為台灣接受西方科技經濟的結構，實施其「發展途徑」的行動模式，也就是使經濟自由化、資本主義化、社會多元化、分工化等等。因而導致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逐漸現代化，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

壹、現代化理論的論旨

英格勒斯（Alex Inkeles）對現代化理論的發展說：「大約在 1950 年的十年間，經濟學家在社會變遷的研究領域中，扮演了帶頭的角色，其經濟發展的概念，已成為大家共同遵守的範例。但是當其他學科也開始注意此課題，並把社會生活的其他層面也納入時，另一個可以反應全球性社會變遷的「現代化」便出現了，它已取得普遍接受的

地位。」¹

現代化發展的問題，為何會有其不同的研究途徑和理論，這是因為研究者對現代化的特徵、引發社會變遷的因素所持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特別重視經濟發展，有些人偏重政治活動，亦有些人則強調影響變遷的社會、文化或個人的心理因素。²以現代化理論來看發展問題，其研究架構可分為二個觀點：

一、現代性（modernity）的研究

現代性論者認為傳統社會的價值、制度、行為模式，都是傳統社會低度發展的原因，也構成了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主要障礙。只要克服這些內部因素的缺點，就可以發展成類似像西方的現代社會。³從這種觀念所發展出的現代化理論，就是一種西化。把西方文化無限的擴散到非西方的世界。那麼，現代性所要具備的研究途徑又可分為三種，分述如下：

（一）心理人格的詮釋

社會心理學家麥克卡蘭德（David McClelland）從對韋伯（M.Weber）的認知，認為經濟發展能否成功，其企業精神是最主要的動力。他以成就感之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作為衡量企業精神的中心變數。⁴一個國家人民的成就需要高，經濟發展也就愈快，反之亦然。而個人成就需求的高低取決於幼年的家庭環境。其過份受

¹蕭新煌，《低度發展與發展》，台北：巨流圖書出版，1985年，頁98。

²江炳倫，〈社會變遷與現代化〉，《中央月刊》，第3卷，第11期，頁200。

³馬紹章，《發展理論》，台北：聯經出版，1988年，頁28。

⁴Davi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ement Motive in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B. F. Hoselitz and W. E. Moore (Unesco-Monton, Press, 1963) PP.74-86.

壓抑及被驕縱的孩子，長大後的成就要求不會很高。望子成龍的不二法門，是從襁褓中就開始鼓勵幼兒自立自發，培養其自己動手動腦的習慣。總而言之，一個社會成就需求的總量，可以由養育孩童的習俗看出來。而養育教導幼兒的方式，與現行的社會價值、意識型態與宗教都有其密切的關係。因此他認為開發中國家具有成就取向的人數較未開發國家為多，因此也就決定了他們經濟成長上不同的程度。

另一經濟學者海根（E.Hagen）也是由心理因素來解釋未開發的現象。海根認為每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所發展出來的。他認為，傳統社會特別重視權威，助長了一種只知對上承顏屈膝，對下作威作福的專制性格，一脈相傳，很難見到顯著的變化。假如因為某種歷史意外事件，社會上的某一部份人突然發覺自己的價值觀念，工作努力和生活方式不再受到重視，自然會徬徨若失，變成十分孤獨怪癖。這樣傳了數代以後，一部分的後代將會不甘長期受屈辱，想盡辦法打出自己一條新路，而創造出新的火花與奇蹟。⁵

一個人失去了原來的地位，不再受社會各階層的敬重時，他必定非常悲傷與憤恨。將這種心理帶回家裡，難免都會以粗暴專制的態度對待妻兒。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小孩，多數變得畏縮。這樣一代復一代，做父親的越不務實際，其教養子女的責任，勢必落在母親的肩上。如果該母親是一個精明能幹而又有同情心的女性，就可能教出不甘永遠屈居人後，決心突破周遭的一些不合理的約束，並敢以不尋常的方式來爭取社會和別人尊重的下一代。簡言之，孩提時期社會化模式的改變，可能會引起人格類型的改變，而人格類型的變化又會影響社會變遷，由於教養模式的改變，會引起變動，因此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價

⁵Everett E. Hagen,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 : A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Vol.19, No.1,1963,PP.20-34.

值也隨之誕生。⁶

綜合上面所述，兩位學者的論點，我們可以歸納出二點特色：第一是心理性的發展理論較強調那些對經濟發展不利之社會或個人特質。第二是未開發國家欲快速的到現代化的國家，其首要之途，就是從個人心理特質上改變著手。

（二）有關個人現代性（Modernity）的研究

現代化研究除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因素外，還有對個人主觀上取向的變遷的掌握也是相當重要的。換言之，人類必須在思想，感情和行動上有所改變時，才能算是真正的現代人。⁷而現代人特徵，在具體的內涵上，又可分為以下幾點：⁸

1. 現代人大量接受大眾傳播媒介，他們是報紙的忠實讀者，專心聽取收音機和電視，並且關心政治事務。
2. 消費取向，現代人渴望有新財富；技術精良的娛樂及節省勞力的設備，而且他們願意住在城市。
3. 現代人贊成分配的原則。他認為應該以貢獻的多少，而不是以特殊的地位與特質來決定報酬。他尊重別人的權益；贊成女性的平等地位；反對權威的家庭制度。

⁶同註 3，頁 29。

⁷ Alex Inkeles,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in Myron Weiner (ed),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pp.140.

⁸ Alejandro Portes,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A critiqu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9 1974, pp.249-250.

4. 現代人比較願意接受新經驗，樂於更新與變遷，而傳統的人則比較不能夠接受新觀念，新感情和新行動。

5. 世俗化：

現代人對於科學與工藝具有甚深的信心。他們認為控制與改變這個世界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達到的。他們渴望未來的生活，做事有計畫，能夠井然有序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反之，傳統的人則因缺少進步的技術，只得依賴現實環境得賜予與命運的安排。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只有逆來順受，並以宗教來安慰自己。

6. 個人主義：

現代人非常強調個人事業的成功。他們認為社會對於個人的成就是開放的，如果一個人願意而且嘗試去做，他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因此，他不喜歡大家庭制度，希望能從大家族的忠誠及責任中解放出來。傳統的人則生活與親族有很大的關係，他和他們分享成功和失敗；並且共同合作，共享財產。這種生活使他們依附親戚以求安全。

7. 參與和同情感的態度（Empathy）：

一個現代人是能夠對大環境中的問題，提出主動和形成意見的。而傳統社會的人，即使有主張，但是在表達的時候，也會顯得慎重。另一方面，現代人會注意到歧異的意見，而不以他人的意見做為自己的意見。但是他不會以社會地位的高低標準去接受或反對意見。

（三）從文化論的解釋

自 1960 年以來，東亞在經濟發展的成就，已引起歐美學者的關注，在尋求解釋「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時，他們發現了這些地區同時具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儒家的倫理已深入民間，構成思想文化的重要因子。於是部份學者開始討論，儒家倫理對於東亞經濟發展是否具有有利的因素。⁹

這些從思想文化層面來解釋東亞經驗的學者，多少是受到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的影響，也就是韋伯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所論述的，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與喀爾文教派為主的新教倫理有著密切的關係。¹⁰

有許多研究現代化學者，不顧韋伯對許多歷史、結構等條件的配合，只針對心理文化因素，企圖找出有利於現代化的心理，諸如成就動機、現代性格等概念，就應運而生。¹¹其實，這研究本是建立在嚴格的經驗研究 (empirical studies) 的基礎上，不能不視為其實證基礎。惟有解釋現代化或發展的問題時，這種唯心論的解釋勢將面臨到很大的挑戰，因為縱使在同一文化體系下，不同的區域發展都有很大的分歧，顯示結構因素及外在環境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¹²

文化論者仍不免從觀念及價值的角度，企圖尋求文化與經濟成長的關聯性。例如柏格 (Peter Berger) 認為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等幾個地區在發展上的成就源於「世俗化的儒家倫理」(Vulgarized Confucian Ethic)，因為儒家思想中有世俗化的特徵。諸如強烈的成就

⁹杜念中、楊君實，《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台北，允晨出版，1988 年。

¹⁰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Unwin, 1930.

¹¹同註 3，頁 28。

¹²張家銘，《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台北：圓神出版，1987 年，頁 171-176。

動機、以家為主的高度群體性、儲蓄的美德，重視教育等，都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發展因素。¹³

在韋伯的《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書中，將中國與西方做對照式的比較，認為傳統以來的儒教與孔子教學，不但無助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形與發展，反而構成一大阻礙。學者金耀基就據此認為韋伯的儒家倫理觀，正受到東亞地區幾個社會驚人的經濟發展現象所挑戰。¹⁴事實上，韋伯只關心發生在十六、十七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原因，對於其經濟理性主義的萌芽感到興趣，我們不可能苛求韋伯要了解在東方的世界，更不期望韋伯學說能正確解釋百年後的東亞經濟發展的經驗。

再者，在 1960 年代西方漢學家普遍認為儒家思想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原因，如賴微等就指出，中國儒家思想重農抑商、多子繼承制度、不當的儲蓄、重視文字鄙視工藝等觀念都不利於現代化的發展。反映西方學者把儒家視為封建帝的護身符，小農社會愚昧象徵等，都是從負面來批評儒家對現代化的阻礙。

一直到 1980 年代，東亞經濟快速發展的事實，使得學者也開始尋求儒家思想中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因子。如學者蕭新義研究儒家思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觀念，如勤儉、向學、敬業的美德，同時也有阻礙經濟發展的思想，諸如只重視人文卻忽略了科技。僵固保守只維持現狀的穩定而不求進取等等，這分析是較能掌握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的實際真相。¹⁵

¹³同註 10，頁 227。

¹⁴朱雲漢、彭懷恩，《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台北：時報文化，1980 年，頁 11。

¹⁵同註 10，頁 45-84。

二、演化論與結構功能論

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等人認為對社會的觀點，是一種進化的理論。基於人類社會與生物有機體極為類似的「有機體比擬論」（Organic Analogy），使主張演化論的社會學家相信，進化表現在人類社會上，是從簡單的社會進化到複雜的社會。¹⁶而二十世紀中葉，新的演化論與結構功能論相互呼應，強調個別社會的調適能力，重視以系統角度來看社會。即社會系統具有需求及功能要件，以保持生存。在系統能正常運作的前提之下，任何系統也要達到進化的目標，即結構日趨分化，功能則朝向專門化發展。¹⁷

所以，新的演化論不過是對社會演化在不同階段具有之主要社會結構特徵，做一種分類，並沒有對社會為什麼變遷，如何變遷的問題提出明確的說明。然而，新的演化論卻是現代化理論的思想前提，如帕森思（T. Parsons）的結構功能主義，就毫不加以批判的接受演化論的假說。¹⁸也唯有以此論點來分析現代化，又可分為以下兩種觀點：

（一）過程論：

從社會變遷的過程研究現代化，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於帕森思。他視社會與文化的演化有如有機體的演化一樣，透過變異與分化，從簡單趨向複雜。社會演化可分為三個階段：原始的、中間的和現代的。他界定現代社會體系約在十七世紀於西歐開始發展，十八世紀進一步朝向民主和工業化方向演化。「現代化的過程」即是起於西方，藉著殖民和擴散而延伸到別處。

¹⁶David Jary and Julia Jary,《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1998年，頁660。

¹⁷彭懷恩、張力可，《社會學思想史》台北：風雲論壇，2000年，頁244-255。

¹⁸蔡文輝，《行動理論的奠基者—派森思》，台北：允晨，1982年，頁145-146。

帕森思認為演化的過程表現出下列要素：

1. 在功能互賴的模式中，系統單位有逐漸分化的傾向。
2. 在日漸分化的系統中，建立了新的整合原則和整合機能。
3. 就與環境的關係而言，已分化的系統之生存能力也日趨增加。

19

運用這些假設來看現代化過程，自然會認為社會變遷將由低度開發如落後、未分化、鄉村主義走向現代化工業、現代都市化。就如帕森思的弟子史美色（N. J. Smelser）所說的：「當我們使用『發展』這名詞時，我們想起至少四種不同但又相關的過程：（1）技術方面，發展中的社會由簡單和傳統的技术到科學知識之運用。（2）在農業方面，發展中社會會從自給自足式的農業，演化到農產品的商業化。（3）在工業方面，發展中的社會由使用人力轉變到工業化。（4）在生態環境上，發展中社會會從農場與鄉村變動集中到都市。」²⁰

史美色與帕森思不同的是，他認為進化的過程當中，若是結構分化與整合之間不均衡發展，則會出現社會動亂（social disturbances），即現代化過程的不連續而造成的混亂。這是因為舊社會秩序在瓦解，而新的秩序卻尚未完成，造成現代化的中斷。

社會學家用「系統過程」來研究現代化，多不脫離帕森思的結構功能途徑，例如賴微在「現代化與社會結構」中，就是用「體系」的觀點來分析「較現代化」和「較不現代化」的社會。他運用「傳播的

¹⁹同註 19，頁 147。

²⁰ Neil J. Smelser, "Toward a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in *Essay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pp. 125-146.

技術」(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指標，企圖證明美國較蘇聯更現代化，因為美國社會除了政府權威外，都較蘇聯更集中化 (centralized)。²¹賴微又說：「現代化過程走得愈前面，集中化程度必然愈強，以維持穩定性的存在」。因為從體系論的立場，維持體系的穩定，是最重要的生存要件，所以現代化學者多強調整合 (integration) 的重要性，忽視了衝突 (conflict)，甚至將其視為病態而加以批判，卻不深入探討造成衝突的原因。

政治學者阿爾蒙 (Gabrial A. Almond) 也是用結構功能的觀點來分析政治，在他對政治體系的分類中，以「結構分化與自主化」的程度；「政治文化世俗化」的指標，從事政治體系的分類：(1) 原始與傳統的政治形式；(2) 現代民主與專制的政治形式。²²基本上就是帕森思想的「政治學」的翻版。

(二) 階段論：

現代化理論中，把西方社會視為發展的理想模式的觀點，是普遍存在於歐美學者的意識形態。但是究竟如何達到現代化社會則有不同的看法，就如表 3-1 所顯示，「階段論」的出現是修正傳統與現代社會的兩分法，而強調過渡階段的重要性。冷納 (Danial Lerner) 提出過渡社會的概念，指邁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傳統社會逐步消逝，在過渡社會中，人愈趨於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具有高度的理性與積極求進的精神，並且具備設身處地的心理，即冷納所說的「同理心」 (empathy)。²³

²¹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56.

²² G. A. Almond and J.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²³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 Free Press, 1965.

表 3-1 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比較

	傳統社會	現代社會
社會類型	身分歸屬；鬆散；自我取向；特殊主義；重情感；家族主義；社區；機械式團結。	成就；有機式團結；情感中立；社會；契約關係；嚴密；集體取向；普遍主義。
社會結構與社會階層化	大家庭；結構分化低；縱面與橫面流動率皆低。	小家庭；結構分化高；縱面與橫面流動率皆高。
經濟系統	多功能單位，未分化，缺乏自主的地位；偏重農業與遊牧業；低國民所得與消費；低剩餘資本與生產；基層經濟發展水準低。	單一功能或有限功能的單位，明顯的分化，具自主的地位；偏重工業；高國民所得與消費；高剩餘資本與生產；基層經濟發展水準高。
文化系統	社會化限於初級家庭與同儕團體；信仰系統強調身份歸屬與宿命論價值；地域性的政治文化。	社會化及於初級與第二級層次的組織（如經濟、政治組織與大眾傳播）；信仰系統強調成就與創新的價值與行為；參與的政治文化。

資料來源：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1992年，頁128。

以階段論觀念來分析經濟發展，以經濟學者羅斯托（W. W. Roston）在1960年代發表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為代表。羅斯托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分為五個階段：（1）傳統社會；（2）起飛社會；（3）起飛期；（4）成熟期；（5）大量消費期。羅斯托指出經濟發展之前必須具備足夠的資本，也就是資本累積足以支持經濟起飛，這個過程就是過渡階段，待工業化完成才算是達到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羅斯托顯然是以對英國工業革命的分析做模型，他主張所有社會都要經過單一的發展階段，即以資本投資的速度來促進經濟起飛，再進而達到工

業社會，大量消費社會等的西方經濟的型態。²⁴

行政學家羅格斯 (F. W. Riggs) 也是以結構分化的觀點，將傳統、過渡、現代化三階段，借用光學的譬喻，定名為溶合的 (fused) 社會，稜柱的 (prismatic) 社會、繞射的 (diffracted) 社會。分述如下：

1. 溶合的：

指傳統社會是未分化的社會，只有一個結構，如同白光一樣，光譜中其他顏色隱藏不露，可稱為溶合的社會。就好像傳統社會中的官僚系統沒有角色變化，由一種角色履行維持體系的種種功能。

2. 稜柱的

指過渡社會已具備分化的結構形式，但是往往無實質的功能，就如白光透過稜柱媒介體，發射為各種分化的色彩，所以稱為稜柱的社會。例如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官僚系統引進歐美的行政程序及組織，卻無法履行其功能。

3. 繞射的

指現代化社會是已經分化的社會，具有各種特殊的機械各司所職，好像白光透過水晶稜柱，色澤分明，所以稱為繞射的社會。²⁵

羅格斯強調，他所提出的三階段社會是理想模式 (Ideal type)，在真實世界並不一定存在，但是其概念架構仍不脫離演化論的前提。

²⁴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²⁵ Fred W. Riggs, *The Ecolog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過程論與階段論支配了六十年代的社會學界的思想，都以演化論的觀點來分析歐美「先進」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差別，認為兩者是「現代」與「傳統」的兩級，後者只要步隨著西方歐美的發展經驗；工業化、都市化、提高識字率、促進社會流動，建立民主政體，就能夠進步到現代社會。誠如學者所說：「現代化理論的強烈意涵即是視過程的最後階段優於最初階段，這觀點下的單線式演化觀點，意味著社會的任何進步，唯有逐漸趨近現代性所包容的價值取向。它不可避免地做了以下的結論：現代性必須予以探討，而傳統則必須予以避免。」²⁷無怪乎，以演化論為出發的現代化論被批評為以歐美為中心的種族主義。

現代化理論對於發展政策的影響非常大，因為戰後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聯合國及世界銀行的專家，都視西方經濟發展經驗及科技傳播為發展中心地區邁向現代化社會之「典範」，只要這些國家「改造」既有結構，「西化」成類似西方國家，即可解決貧窮落後的問題。依此假設，現代化論者提出了一些「發展指標」，諸如，都市化程度、政治民主化、職業分化、自由企業、社會流動程度等，作為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²⁸

事實顯示，這發展政策卻使第三世界國家陷入更貧困的地步，根據國際關係學者的發現，國際差距，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反而加大。持批判立場的學者指出，現代化理論常有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本質，提供意識形態的假面具。西方資本主義須靠擴張以求生存，它必須伸出多面的觸角遍佈全球，但是他的擴張成功仍大部份依賴擁有再生產的

²⁶同註 13，頁 143。同注 79，頁 227。

²⁷同註 1，頁 74。

²⁸同註 1，頁 64。

能力，西化無礙的就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

再者，現代化的結果使落後地區更加依賴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換言之，歐美國家的發展與落後地區的低度發展是一體的兩面。

貳、從現代化理論看台灣發展經驗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所面臨的是飽受戰火洗禮滿目瘡痍的景象然而經過四十年的現代化建設以使這天然資源匱乏的島嶼成為開發中國家經濟建設成功的典範。這一切發展並非建立在一連串的僥倖與偶然穩定的政治體系正確的經濟建設有秩序的社會結構，皆促成高速而安定的社會發展。

幾乎與台灣現代化建設發展的同時，歐美社會科學家開始廣泛的探討現代化與發展問題。無論是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及社會心理學都開始對本世紀急遽的社會變遷現象，從事實研究及理論建構。本節從現代化理論，來檢視台灣這四十年來的發展，而在探討的過程之中，本文從一些發展的指標來從事分析台灣在經濟現代化過程的種種現象。

一、經濟的現代化

經濟學者顧志耐（**Simon Kuznets**）在他的著作「近代經濟成長—成長率、結構及發展」²⁹提出了近代經濟成長的特徵，這些特徵包括：(1).每人生產的增加率(每十年的增加從不到15%~30%)，(2).每十年15%的成長率(3).各部門技術與組織效率的變更，說明結構迅速轉

²⁹ Simon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

移。(4).總生產中各部門的趨勢，農業與相關企業大為減少，工業部門略為增加，而服務業呈現顯著的上升。(5).導致每人生產高成長，使國際貿易大幅擴張，工業生產結構快速轉變。(6).依經濟單位的大小形式，從自營式的小商店，擴展到公司式的大商店，勞動的分配被雇者地位快速變遷。(7).就生產結構觀之，工業上的變動最為快速，又人口成長以都市化移轉。(8).開發國家的所得分配，差距縮小，高所得者的所得下降，而低所得者的所得上升。(9).國民生產，從 10% 增加到 20%。

在職業結構方面，民國四十年有 56.69% 的就業人口是從事農業生產，16.31% 的勞力從事工業生產，27.00% 的勞力從事服務業的工作。到了民國八十年，這些比例轉變為農業部門 13.09%，工業部門 40.12%，服務業 46.79%。³⁰這意味著，隨著工業部門和服務業的快速成長，必然創造出更多各式各樣的新興行業，並帶來分工的日趨精密和從業人員的專業化。³¹

學者 W.W. Rostow 所提出的經濟現代化的五個階段，對現代化理論學者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Rostow 認為，所有的社會都會經歷五個經濟成長階段：³²

1、傳統社會 (the traditional society)：指農業社會，生產力低，缺乏科技，政治權力集中。

2、起飛前預備 (the 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開始轉型，傳統的社會結構及生產技術仍然普遍，現代製造工業開始發展，商業投資增

³⁰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年刊，1991 年，頁 27，第 16 表。

³¹張曉春，《近三十年台閩地區職業結構的變遷》，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年，頁 527-555。

³²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 年，頁 44-63。

加，民族國家形成。

3、起飛期（the take off）：傳統的觀念與制度逐漸消失，新的技術與發明被使用，經濟呈現起飛式的成長，投資大幅度的成長，快速的都市化與商業化。

4、邁向成熟期（the drive to maturity）：技術更精密複雜，重工業比例加重，出口大增，經濟活動國際化。

5、高度大眾消費時期（the age of high mass-consumption）：服務業日趨發達，個人所得增加，社會福利與安全成為國家的首要目標，人民可以有奢侈的生活消費，此階段在 1920 年代之後的美國及 1950 年代後的西歐國家與日本為此一時期可茲見證的實例。

二、政治的現代化

受到帕深思的結構功能論影響而建立的「現代化理論」，是結合經濟、政治、社會等現代化來看民主政治的建立，深深影響 60 年代的社會科學界，其基本假定是由於社會體系日益趨於複雜化，功能專化，結構分化的結果，使政治體系也必須趨於多元化才能因應內外環境的挑戰。結構功能論是從生物演化的觀點來看民主政治的形成，即是以民主為目的，任何政治體系從傳統崩潰之後，經過發展的過程，最終可以達到民主的理想。³³

按照現代化理論的看法，民主政治的前提必須要有一個現代化社

³³ Thomas B. Gold and Gwo-shyong Shieh,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zation in East Asian ; Empirical Observations" in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 Jan9-11,1989,PP.1-2.

會，這社會的形成又有賴經濟的發展。待經濟發展後，就是誠如田宏茂教授所說的，「工業化和高速經濟成長帶來的影響是社會體系中的公民及結構發生變遷。」³⁴這變化在社會結構上最顯著的特徵是中產階級的崛起。最後，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矛盾衝突，必須透過集團活動來表達及爭取社會的注意及有利的政策輸出，形成社會多元化（**Social Plualism**）這又促使政治體系必須開放參與管道，才能疏緩這些需求的壓力，這一切都促使了政治走向民主。³⁵

從現代化理論來解釋台灣政治體系日趨自由化是有其價值的，例如杜意契（**K.W. Deutsch**）從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ty**）的觀點來看政治發展，即因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現代化，社會成員溝通頻繁，知識水準提高等都有助於政治走向民主化等。³⁶這些學者所描述的現象，都能夠在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中顯示出來。以下將針對學者對現代化與台灣政治發展的關係做一歸納性的描述。

（一）經濟發展帶動了政治民主化

經濟發展做為政治發展的前提，就好像學者金耀基在分析台灣從傳統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同時。又能規避了政治發展的陷阱，這是因為台灣自 1960 年代以後，由於經濟現代化的結果，社會的力量越來越雄厚，同時更出現了社會多元化的傾向，這都是使得台灣趨向全面政治民主化的有利因素。³⁷

³⁴ Tien Hung-Mas,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Jan9-11, 1989*, P.4.

³⁵ 龐建國，〈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兼顧中華民國台灣的經驗〉，《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1 期，頁 37-51。

³⁶ Karl W.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0, 1961, PP.491-509.

³⁷ 金耀基，〈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的突破〉，台北：時報出版，1990 年，頁 366。

彭懷恩教授在「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從現代化角度來觀察，台灣採取民生主義計畫性的自由經濟體制，以使台灣創造了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事例，也因為經濟成長所導致的社會變遷，使政治體系日趨多元化及開放化。³⁸

（二）政治發展是邁向民主政治的過程

政治發展不是一蹴可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日之間就可以建立起來的。政治發展是有其階段性的，因此學者葛永光在「民主化與台灣的政治發展」一文裡，借用美國經濟學者羅斯托（Walt W. 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的概念。將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民主奠基期（民國 38 年—66 年），民主成長期（民國 66 年—75 年）及民主起飛期（民國 75 年至今），並認為台灣的政治發展，隨著政府的解嚴，以及之後的一連串的改革與修訂相關法令，認為這些都是政府決心經由制度化發展邁向政治民主的具體表現。³⁹

（三）政治文化的轉變

國內有關政治文化之研究，以江炳倫教授對於「台灣地區人民政治文化與投票指向之調查研究」為最早。⁴⁰其主要論點集中在政治文化中權力特質的探討，並強調政治文化應區分層次，至少角色行為規範的文化應與決策過程的文化，在層次上有所分別。

³⁸彭懷恩，《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台北：時報出版，1985 年，頁 468。

³⁹葛永光，《民主化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收錄於邢國強主編，《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1988 年，頁 327-336。

⁴⁰江炳倫，《台灣地區人民政治文化與投票指向之調查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出版，1973 年。

胡佛教授的研究將政治參與態度分成：陳情權、改革權、要求權及干預權等四種權力價值取向，然後對這四種權力實質取向，將政治參與態度，分為現代、傳統及轉型等三個類型。在實施問卷調查後，結果發現：我國民眾現階段的政治參與態度正處於轉型的類型，並且我國民眾的結構性政治文化與功能性的參與文化具相當顯著的積極。⁴¹

胡佛教授長期從事台灣地區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顯示出國人因教育普及、生活水準提昇，使傳統權威人格下降，公民參與意識提高，在在都培養了有利於民主發展的政治態度。⁴²

袁頌西與陳德禹兩位教授將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按基本權力價值取向分為：平等權、自主權、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五種權力取向，然而針對台灣地區年齡在 20 歲至 70 歲的民眾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民眾的政治文化，以逐漸擺脫傳統政治文化之支配，取向於現代民主政治文化。另外，從研究中發現：未來的政治發展，知識份子、中產階級、以及勞工將扮演主動的角色，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⁴³

綜合上述所說，就長期的趨勢而言，台灣的政治發展，大至上是符合現代化理論所分析的，即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大致呈現一種正向關係。隨著均富型態的經濟成長，帶來了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閒暇時間的增多，交通和傳播事業的發達，以及都市化的加深，促進了台

⁴¹胡佛，《台灣地區民眾對政治參與的態度：系統功能的權力價值取向》，台北：南港，1988年，頁 327-354。

⁴²胡佛，《台北市政治參與行為的比較分析》，台北：聯經出版，1985年，頁 99-172。

⁴³袁頌西、陳德禹，《台灣地區民眾的政治文化：系統結構的權力價值取向》，台北：南港，1988年，頁 299-326。

灣社會中人民政治參與的意願和能力。同時，財富分配的改善，則為台灣社會培養出一個日益堅實壯大的中產階級，防止了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兩極化趨勢。這些都為台灣的政治發展朝向民主化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社會的現代化

在現代化理論的範型之下，社會變遷的諸多面向，不只是被視為現代化過程的表徵，而且是認為可以被用來加以預測度的變項。也就是說，任何的變遷都被視為是一種過渡的現象，其最終的目的終究會轉型到一個更成熟的現代化階段。早在 1960 年代，社會學者龍冠海在一篇文章中，裡面羅織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現代化後果」的清單，包括有：人口、經濟、政治、教育、家庭、鄉村與都市諸層面的變遷，在在顯示台灣已進入了現代化的時代。另外，社會學者陳紹馨，在其 1966 年的一篇文章中，也同樣引用相同的現代變遷索引方法，更直接指出戰後台灣的社會文化變遷與日據時代最大的差異是這種變遷是一種「自由性由下而上的現代化」。⁴⁴有關社會的現代化，我們將從都市化、家庭結構、階級結構及社會成員的現代性三個指標來衡量台灣四十年來發展的歷程。

（一）階級結構

資本主義下的工業成長和都市成長，明顯導致了台灣數十年來的社會結構轉變。而社會結構的轉變最明顯的現象便是新結構成份的產生和舊結構成份的式微。大致上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社會結構孕育出兩個新生的階段。一是城市的勞動階級，二是城市的中產

⁴⁴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期刊》，第 22 期，頁 13。

階級。這兩個階級形成的原因正是工業化和都市化不斷開展使然。

有關台灣社會階級的探討文獻是相當的豐富的，有的是從階級結構中的某一階段來探討台灣階級結構的流動與特色，例如徐正光就探討工人的工作滿足與現代性；張曉春探討勞工問題；蔡淑鈴、黃大洲和廖正宏探討農民階層的階級特性和社會地位；葉啟正探討知識份子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林嘉誠探討科技專家階層的掘起、流動及影響等。亦有人從全國性的觀點來探討台灣的整體階級結構，例如張紹文等人在大學雜誌所發表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中探討整體的台灣階級結構及其特質；許嘉猷根據勞動力人口的經濟特色，劃分台灣的階級結構為資本家階級、小資本家階級、經理階級及勞工階級，進而剖析台灣階級結構的特色等。

不論是從單一階級的探討，或是從全面整體的觀點對階級結構的探討，皆支持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同為經濟變遷和資本主義化的假設。換言之，台灣四十年的社會結構發展，相當程度愈來愈接近「現代的資本主義工業國」的型態，而愈來愈遠離傳統的低度開發國家的型態。

（二）家庭組織

功能論者以核心家庭做為現代化的一項重要特質，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繁榮已經使台灣發展為一個新興的現代化社會，而台灣家庭組織的變遷自然構成現代化假設之驗證。國內學者謝高橋在 1980 年所做的研究中指出台灣地區由於受到社會現代化的影響，家庭制度有轉變為核心家庭的趨向。⁴⁵

⁴⁵謝高橋，《家戶組成，結構與生育》，台北：政大民社系人口調查研究室出版，1980 年。

（三）社會成員的現代性

由於交通方便，傳播事業發達，工商業興起貿易往來頻繁，以及有意的學習，這四十年來，台灣無論在學術文化或者生活習慣上，都受到了西方社會相當程度的影響。以歐美先進國家的思想行為為範型的現代人的各種特性，自然也多少融入了國人的行為模式當中。儘管今天台灣地區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為，仍然反應出某些傳統社會的質素，但是毫無疑問的，從楊國樞、李亦園等學者歷年來對國人從事現代化歷程對心理與行為的影響等若干大小的實證研究顯示，現代性的成份已經比過去濃厚許多了。⁴⁶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基於不同的立場與學術領域的訓練，研究者對於台灣的發展成就就會有不同的理解與評價，但從一些發展指標而言，也證實了台灣過去四十年的發展經驗，大體上是符合現代化理論所陳述的。也就是說，台灣的發展經驗頗能驗證現代化理論的有效性。然而到了 1980 年代，當台灣發展已被公開的視為東亞經濟奇蹟的事實時，把傳統文化當作阻礙現代化為核心命題的現代化理論的範型，遭到「台灣奇蹟」嚴重的衝擊與挑戰，因此在現代化範型這一陣容內的學者，在面臨到台灣奇蹟的挑戰時，沿襲他們專注內在因素而排斥外在因素的邏輯，紛紛在台灣內部條件中找尋有利於台灣發展得以發生的因素。

⁴⁶彭懷恩、朱雲漢，《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台北：時報出版，1982 年，頁 397-404。

第二節 依賴理論與台灣發展經驗

在 1970 年代之後，反現代化理論的觀點開始被提出，這種以「發展或低度發展都為歷史整體的一部份」觀點，無疑已被學術界所重視。甚至可以說在發展理論中，已產生了「典範的革命」(revolution of paradigm)。其主要有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其中，依賴理論的情境當中是比較著重外部因素的發展，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依賴情境有些許上的不同。此時期，另一學者又將台灣經濟依賴又發展的情境，發展出一套可以解釋依賴又發展因素的依賴發展理論，本論文亦在此一章節做一論述。

壹、依賴理論的論旨

一、傳統依賴理論

依賴理論主要是用「核心—邊陲」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來解釋非西方國家的落後原因。如果說現代化理論對開發中國家的解釋為一種內部因素，而依賴理論的解釋就為一種外部因素對發展的影響。它的觀點，認為國際貿易是西方先進國家剝削非西方國家的一種方式。非西方國家的落後是因為西方先進國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和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關係來剝削非西方落後國家的結果。

依賴理論的代表學者法蘭克 (A.G. Frank) 將低度發展和未開發的概念區分解釋於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情況。他認為開發中國家的過去和現在根本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的任何一個階段。已開發國家雖曾經有未開發的時期，卻從來沒有經歷過低度發展。⁴⁷並解釋非西方國家的

⁴⁷同註 1，頁 158。

低度發展之原因，是因為非西方落後國家和西方先進國家之間，過去和目前都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經濟關係。

綜合上述的觀點，依賴理論的主要內容，分析如下：

- (一)、依賴理論對非西方國家的低度發展分析上，與現代化理論不同的是，現代化理論將低度發展的原因解釋為非西方落後的社會內部因素所造成，而依賴理論認為是外部因素所造成的。理論解釋西方國家在發展他的經濟時，並沒有受到其他國家政治經濟勢力的宰制，可是現代的開發中國家卻受西方已開發國家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之影響。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因此受到這種外部因素的影響，阻礙其發展。
- (二)、依賴理論中強調「核心—邊陲」的關係。它將世界體系分為核心與邊陲，而這樣的世界格局由西方已開發國家為主導，西方國家成為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開發中國家則成為邊陲地位。成為邊陲的開發中國家受核心國家的控制與宰制，造成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關係。核心化因而導致開發中國家對西方已開發國家的依賴。使得造成核心國家發展的同時，也造成邊陲國家的低度發展。
- (三)、依賴理論反對西方化，而且帶有反對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色彩。

綜合來說，在國家發展的策略上，依賴理論強調的是開發中國家應該拒絕外資，擺脫依賴，謀求自立更生，必要時還可以進行階級革命，改造社會結構，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二、依賴發展理論

傳統的依賴理論比較強調外部因素的限制，對於開發中的國家經濟發展是抱持著悲觀的看法與態度。在他們的分析當中，依賴的情境使得開發中國家或多或少地落入了低度發展的困境之中，最多只能夠做到「無發展的成長」。

但是，對於所持依賴發展理論學者認為，依賴並不是一個會在所有開發中國家造成相同內部後果的「外在因素」，而是一種普遍性的外在條件和開發中國家特定的內部狀況交互作用下的具體情境。雖然，依賴發展論者同意，核心與邊陲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稱的，但是他們卻跳出外在決定論的宿命思考，而將依賴情境擺在結構和歷史的脈絡中觀察。他們強調，社會結構乃是人們集體行為的產物，但是，同樣的，社會結構也會因社會運動的衝擊而不斷的轉型。

依賴發展理論學者不認為依賴情境會是恆久穩定的狀態，也不相信依賴的情境在每個邊陲國家都會一樣。因此，依賴發展理論學者主張，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不同的邊陲國家中，會因為本土利益集團、政府作為和階級分合的影響而造成不盡相同的依賴情境，同時，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同一個邊陲國家的依賴情境也會隨時空的轉換而產生變遷。這種結合了橫斷面的結構分析和縱剖面的歷史觀照的研究方法，稱之為「歷史結構研究途徑」(historical structural approach)。這種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不但企圖將歷史帶回研究的中心 (bring history back in)，並且認為依賴這個語辭並非是要歸納所有低度發展模式的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特定情境的一種方法論。⁴⁸

⁴⁸袁鶴齡，《國家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台灣案例研究》台北：高立出版，2003年，頁37-38。

雖然，外在世界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於邊陲國家的自主性空間的確有限制，可是邊陲國家仍然有可能透過自身內部的政治結盟和創造性做為，來回應本身所面臨的依賴情境。

從表 3-2 可以看出，雖然依賴發展仍舊屬於依賴學派的一支，而與傳統依賴研究有其相似之處，有關研究的方法論、造成低度發展困境的重要因素、依賴的本質、以及依賴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等方面則有明顯的差異。事實上，相較於傳統依賴研究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採悲觀論調，依賴發展則是以較樂觀的態度面對依賴於核心國家的事實，並認為透過國家內部機制的運作，亦可以促進本身的發展。



表 3-2 傳統依賴與依賴發展研究之比較

	傳統依賴研究	依賴發展研究
相同點：		
研究焦點	第三世界發展	第三世界發展
重要概念	核心-邊陲依賴	核心-邊陲依賴
分析層次	國家層次	國家層次
政策意涵	依賴有害於發展	依賴有害於發展
相異點：		
方法論	高層次的抽象（著重於依賴的一般性模式的建立）。	歷史結構（著重於依賴的特定情境的探討）。
重要因素	外部結構、殖民主義、不平等的交換。	內部結構、國家、階級衝突。
依賴的本質	主要是一種經濟現象。	主要是一種社會政治現象。
依賴與發展	相互排斥，並造成低度發展。	可以並存，是一種結合依賴的發展。

資料來源：袁鶴齡，《國家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台灣案例研究》台北：高立出版，2003年，頁38。

貳、從依賴理論看台灣發展經驗

一、從傳統依賴看台灣經驗

在許多學者的心目中，台灣的經驗發展對於依賴理論構成了嚴重的挑戰，是依賴理論的異例。比如說，Alice Amsden⁴⁹在1979年的時候，率先提出了台灣發展經驗是對依賴理論之一項挑戰的說法，接著陳玉璽⁵⁰等人都以台灣的發展經驗來印證依賴理論的說法，也都承認台灣在依賴的情境下有著相當快速的發展，並沒有陷入發展停滯的困境。

依賴理論認為，在依賴的情境下，第三世界國家將無可避免地落入低度發展的窘況，而低度發展現象最重要的特徵有二，即發展停滯和分配惡化。所以，依賴論者認為依賴情境會造成發展停滯和分配惡化的機制，然後一一驗證台灣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實際狀況。

首先，在發展停滯方面，Barrett 和 Whyte 提出了六個命題。第一，依賴理論認為，外國公司會將在第三世界國家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匯回母國，結果使得從第三世界國家流出的資金比外國公司所帶來的投資數額還大，造成依賴國受到直接剝削。就台灣發展經驗而言，在日本殖民地的時期是有這種情況發生，可是，在戰後的台灣發展過程中，卻未曾出現這種情形。因為，在民國50年之前，來到台灣的外國資金主要是美援，而基於政治的目的，美援的主要形式是贈與，不是貸款，所以，資金是流入台灣而不是流出台灣。民國50年代中期美援停止後，外國廠商開始陸續來到台灣，而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目前

⁴⁹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5: 341-373.

⁵⁰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出版，1992年。

為止，我們所見到的，是台灣經濟的持續繁榮，以及外國來台廠商技術層次的逐漸提高，並未曾出現發展停滯的情形。近年來，台灣雖然出現了資金外流的現象，可是，卻是本地廠商邁出了跨國投資的步伐，好像當年外國廠商來到台灣一般。所以，台灣的發展經驗比較接近核心國家的模式而非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低度發展模式。

第二，依賴理論認為，外國公司引進邊陲國家的設備和技術，大多是核心國家被淘汰的過時設備與技術，所以，邊陲國家並無法因此增加國際競爭力，加快發展的步伐，縮短和先進國家的差距。的確，如果從技術層次來說，民國 50 年代和 60 年代來到台灣的外資廠商所引進的，大多是勞力密集型態的生產設備和技術。可是，這些設備和技術在結合了台灣地區高品質但低廉的勞力之後，卻在國際市場上具有高度的競爭力，打開了外銷市場，同時，在非零和式的關係下，台灣分享到了外銷成長的果實，因而促進了經濟繁榮。經濟繁榮帶來了資本累積能力，這種能力結合上日益提升的教育水準、政府政策的輔導（如設立科學工業園區和制訂產業升級條例等等）、和技術合作過程中的學習，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我們所見到的是，產業技術的層次能夠不斷提高，逐漸縮短了和先進國家的差距。

第三，依賴理論認為，依賴外國資金的結果，使得邊陲社會的國家機關無法有效地扮演保護本國企業、促進經濟發展的角色，於是，造成了外國勢力對邊陲社會經濟的滲透宰制，民族工業無法成長發展。有如日本人殖民期間，現代工業部門的確是掌握在日本人手裡，台灣本地的資本只能在比較邊際的部門發展。不過，台灣光復後，政府接收了日本人的產業，使得比較重要的工業部分掌握在政府手裡。同時，美援的到來使得政府對於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有更強大的掌控能力，而不是失去了掌控能力。此外，土地改革帶來了農村繁榮，勞

力密集產業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而使得台灣地區民眾的儲蓄能力增加。這些儲蓄的潛力在政府相關政策導引下，如肥料換穀制度、亟力維持物價穩定、和具吸引力的銀行利率等等，大多能經由政府所掌控的銀行體系或者民間的借貸系統而轉為工業投資，於是，資本累積持續進展。此外，政府有意地將外資導向出口部門，如設立加工出口區和規定外銷比例等等，也是得外國勢力被局限在一定的經營範圍內，並未侵蝕掉民族工業成長發展的機會。

第四，依賴理論認為，依賴使得國內市場充滿了進口的消費品，並使得外銷場品受到世界市場需求和價格波動的衝擊，結果，經常造成貿易逆差、債臺高築，而無法累積資本，促進經濟成長。在日本人殖民期間，由於「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設計，上述的說法有一部分真實性，當時台灣本身的消費工業受壓制，市場上充斥著從日本進口的產品。但是，在日據時代的後其，由於日本人擬以台灣做為其南進的橋頭堡，所以，在台灣打下了一些工業基礎。同時，在此之前，為了開發台灣的農業生產力和製糖工業，日本人也在台灣進行了相當普及的基礎設施建設，像鐵公路、灌溉系統和糖廠等等，所以，日本的確比一般的殖民宗主國留下了較多的遺業給台灣。在日本人打下的基礎之上，並藉助於美援，國民政府於民國 40 年代相當有效地推動了進口替代工業，並在民國 40 年代末期到民國 50 年代初期，透過匯率調整、頒佈鼓勵外銷辦法、制訂「獎勵投資條例」、和設立加工出口區等等措施，打開了我國的外銷市場⁵¹，並經由外銷的暢旺，從入超轉為出超，累積了大量的外匯，成為世界上外匯存底最多的國家之一。所以，積極加入世界政經體系的結果，雖然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市場的關係更密切，受國際市場的衝擊更直接，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的停滯，反而是促成台灣經濟發展的主

⁵¹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 Garland Publishing Inc.pp.163-197.

要帶動力量。

第五，依賴理論認為，依賴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成長僅限於和外國勢力有勾連的一小部門，這個小圈圈和邊陲社會廣大的落後部門無法連結，而造成了小規模現代經濟部門和大規模落後經濟部門差距越來越大的雙元社會或雙元經濟。我們曾提到過，日本人在台灣所構築的基礎設施和工廠，相當普遍地座落在全島各地，而不是集中在一個地方，同時，教育體系和農會組織也深入鄉間，使得現代部門的影響力不是只局限在一個小圈圈裡，所以，日本人的殖民並未使得台灣成為雙元社會。戰後的發展過程裡，由於政府採行了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路線，這種發展路線結合上日據時期打下而由國民政府進一步改善的基礎設施，如深入鄉間之交通網路、水電設施、和教育體系，然後，再加上農村地區稠密且高素質的勞力，使得台灣的工業發展走上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並且地理分佈均勻擴散的型態，因此，雙元社會的問題並未在台灣發生。

最後，依賴理論認為，依賴外援和貸款的結果，減少了受援國家的資本形成，因而導致第三世界國家較低的經濟成長率。美援對於台灣資本形成和經濟成長的影響，學者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有的學者，像趙繼昌⁵²盛讚美援的作用；不過，也有學者，像 Keith Griffin⁵³認為作用不大。不過，從台灣的發展經驗中，我們最少可以說，美援的到來減輕了國民政府的財政負擔和國際收支赤字，並具有穩定軍心和民心的作用，使得民間的投資意願能夠逐漸恢復，國內資本形成的機制能夠發揮作用，並在美援停止之後，繼續促成資本累積。所以，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依賴理論所指稱的各種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停滯的機制，並未顯現在台灣的發展經驗裡。

⁵²趙繼昌，《美援的運用》，台北：聯經出版，1985年。

⁵³Keith Griffin, "An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 1 : 31-42.

在分配惡化方面，Barrett 和 Whyte 提出了五個命題。第一，依賴造成了不平衡的發展和雙元社會，使得經濟利益集中再由地主、新興地方資本家、買辦和小規模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工貴族等等少數人所形成的小圈圈手裡，造成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土地改革使得地主階級在台灣社會中幾乎整個消失掉，並使得農民得以享受到農村繁榮的果實。以勞力密集的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分散型工業化，則使得鄉村地區的民眾有機會從工業部門獲得經濟利益，而未被排除在經濟成長的果實外。民國 50 年代末期由於勞力缺乏所帶動的工資上漲，則更進一步促進了所得分配的趨於平均。國家機關對於外資經營範圍的限制，和外資未成為台灣資本形成的主要成分，則使得曾經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一頁篇幅的買辦群體，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形成什麼力量。因此，雙元社會的問題並未在台灣發展經驗中出現，台灣地區的所得分配也為隨著台灣地區依賴情境下的經濟發展而走向惡化，反而是出現了改善的情形。

第二，本地的既得利益群體反對政府的所得重分配措施，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惜和外國人勾結，透過外國來施加壓力，因而造成了分配惡化的情勢難以改善。台灣的發展經驗很明顯地和上述的說法抵觸。有鑑於大陸失敗的教訓，國民政府在台灣地區毅然決定地實行了土地改革，促成了農村財富的重分配。當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造成了國內市場飽和之時，國家機關再度拒絕了本地資本家要求聯合壟斷國內市場的籲求，而透過匯率調整和降低關稅等等措施，迫使本地的廠商面對國際競爭，改善本身的競爭能。因此，在台灣發展經驗中，並未出現上述命題所描述的情形。

第三，由於採取了資本密集的技术，依賴國家的工業發展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多，因此，面對對著廣大的「產業後備軍」雇主居於

絕對優勢的位置，可以對勞工予取予求；同時，少數進入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工貴族，為了維護本身的利益而和資本家合為一氣，削弱了工人階級抗爭的力量，於是，工資水準難以提高，分配惡化的情勢也就難以改善。我們已經在前面指出，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主要走的是勞力密集和地理分散的路線，鄉村地區大量的就業機會使得大部分的民眾有機會分享到工業成長的果實，並且由於勞力缺乏的情形出現，而使得民國 50 年代末期以來，工資水準能夠上升。雖然台灣地區的工會組織處於相對的弱勢，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反共意識型態和國家安全考量下，實施戒嚴令的結果，而非勞工貴族在勞工階級中所造成的分化作用。因此，這個命題也明顯地和台灣的發展經驗抵觸。

第四，進口的和國內生產的工業產品侵入了鄉村市場，破壞且取代了家庭的副業活動，剝奪了農村家庭重要的補充性所得來源，並且助長了不平等。除了分散型的勞力密集產業使得農村民眾有機會進入工業部門工作，而使得上述情形未曾在台灣發展經驗中出現之外，我們在討論「生產方式之聯結和非正式部門」時，曾藉謝國雄⁵⁴的研究指出，在台灣發展經驗中，透過外包制度的機制，工業發展所帶來的，是農村副業活動的興盛，而不是機會被剝奪。事實上，今天台灣地區農村家庭的收入，已經有一大半以上是靠農業以外的活動，因此，這個命題在台灣發展經驗中也不成立。

最後，依賴理論認為，在依賴的情況下，外國廠商通常將其組織結構的種要部分留在母國，或者直指派其經理和技術人員到開發中國家掌控公司的運作，所以，跨國公司並未能促進開發中國家經營管理和專業技術人才的增長以及中產階級的興起，於是，無助於所得分配的平衡。在日據時期，日本人的確未曾為台灣培養太多經營管理和專

⁵⁴謝國雄，〈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3 期，頁 137-160。

業技術的人才，而是由日本人自己來佔有這個位置。可是，當台灣光復，日本人撤走以後，中央政府遷台則帶來了大量人才填補上日本人所留下的空缺，成為促進台灣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而隨著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之工業化的開展，以及由大陸來台之學者專家投入高等教育體系的貢獻，使得台灣地區的階級結構出現了中產階級日益堅實壯大的局面，也促成了社會的流動和分配的改善。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依賴理論所指稱的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惡化的機制，也未曾出現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事實上，除了發展停滯和分配惡化兩個主要問題之外，台灣的發展經驗也在其他面向上和依賴理論的論證互相杆格。例如，以都市化的現象來說，台灣地區都市系統（city system）的分佈就呈現出和先進國家比較接近的「大小次第型」（rank-size pattern），而不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呈現的「首要型」（primary pattern）。因此，在都市化的過程中，台灣地區就比較未曾遭遇到困擾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過度都市化」（overurbanization）問題⁵⁵。此外，以政治民主話來說，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也未出現「科僚威權政體」式的民主倒退現象⁵⁶。所以，宣稱台灣發展經驗對依賴理論構成挑戰或是依賴理論之異例的說法，的確有相當堅實的經驗佐證。

二、從依賴發展看台灣經濟發展

近四十年來，外國經濟勢力透過援助、投資和貿易等方式影響台灣經濟的發展。已俱有依賴的事實，卻也俱有驚人的發展成果，因此，以「依賴發展」的觀點來解釋台灣的經濟發展似乎比傳統依賴發展更俱有說服力。學者龐建國就以依賴發展來深入探討台灣經濟整體發展

⁵⁵龐建國，《台灣經驗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幼獅文化出版，1993年，頁13-21。

⁵⁶同註76，頁115-135。

歷程。

學者龐建國是以政府角色、本土資本家、外資為分析問題的三大主脈來探討依賴發展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三角聯盟」的概念架構。他依學者蕭新煌的分法，將台灣經濟發展歷程分為兩大階段。在第一階段裡，台灣處在美國所主宰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地緣政治網絡裡，佔有重要之戰略地位。所以，台灣能從美國獲取大量的軍事及經濟上的援助，這些援助不僅減輕台灣的國防負擔，更有助於台灣政府從事累積資本，安定民心，並可促成促進投資意願，這也使得台灣暫時被隔離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衝擊之外。而且，美國的援助是基於政治目的，和美國的跨國公司利益沒有利害關係，因此，並沒有和一般傳統依賴理論所假設的阻礙了台灣的經濟發展。⁵⁷

所以，台灣政府在此一階段在三角聯盟當中位居於主導的地位。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後，為台灣帶來了一批富經驗的決策菁英，以及大量的技術和行政人才，填補了日本撤退後所留下來的才空缺席。另外，國民黨政府將美援大量投資在交通、水利和電力的開發上，為台灣奠定基本建設的良好根基。由此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主導了台灣的經濟發展。⁵⁸

至於地方資本家在此階段中並未佔有太多的份量。因為在殖民地時期日本人的限制，台灣並沒有形成有份量的本土資產階級。加上國民黨政府成功的實施土地改革，因此，台灣一直未能有強大的本土資產勢力產生。這也使得台灣後來工業化能夠在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上開展。至於外資方面，由於當時台灣的特殊政治情勢，外資根本

⁵⁷同註 32，頁 298-299。

⁵⁸同註 32，頁 299-300。

不敢進入，直到 1960 年代中美援終止後才開始陸續的進入。⁵⁹

在第二階段中，台灣首先面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外在環境的大變動。1950 年代末，美國的經濟不景氣導致國內資本積極尋找海外投資市場，日本國內有些夕陽工業也急於找尋海外據點，外資就在這種環境下開始進入台灣。同時，台灣對外貿易數額也開始增加，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力已逐漸取代國際地緣政治網絡，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上的大結構環境。⁶⁰

由於 1960 年代正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大幅度擴張的時期，國際經濟景氣良好，非常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將產品銷往核心工業國家，台灣也趁此一機會致力於拓展對外貿易，獲得不少利益。而外資在此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由於外資適時遞補美援中所留下來的空缺，使台灣有足夠的資本繼續從事發展。然而，外資在台灣並未產生如傳統依賴理論所說的會去宰制台灣經濟的局面。這是因為在外資進入時，台灣已經有了不錯的經濟基礎，加上政府仍然掌控能源、原料和重型工業的基礎部門，外資才無法予取予求。所以，外資在台灣似乎是發揮了正面的效果，但卻無法宰制其台灣經濟的發展。

至於本地資本家，在第一階段時因受到政府實施保護政策而日漸成長。雖然在此階段面臨政府逐漸撤除保護措施所帶來的衝擊，但是本地資本家還是能夠利用台灣豐沛的勞力，在國際經濟市場仍然具有相當的競爭能力，再加上與外資的合作，為台灣帶來相當長時期的外銷順暢。

而政府因素在此一階段之角色比較第一階段有些的改變。1970

⁵⁹同註 32，頁 300-301。

⁶⁰同註 32，頁 302。

年代初期及末期的兩次石油危機，再加上外交上的措敗，都為台灣政治經濟局勢帶來不小的震撼。但是，國民黨政府均能夠適時的推出有效的政策及時化解這些危機所帶來的傷害。1980年代起，台灣所面臨的世界政經體制又起了一些變化。首先是中國大陸開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東南亞效法亞洲四小龍積極推動勞力密集製造業及歐美採取經濟保護主義。在國內，台灣民間的社會力量則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壯大。這對台灣之政治經濟生態產生不小的衝擊，也使得政府的影響力相對減弱。儘管政府在此階段之發展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節 世界體系理論/雁行模式與台灣經驗

世界體系理論與雁行形勢模式的觀點有極其類似的地方，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是以核心國家、邊陲國家與半邊陲國家的概念闡述世界經濟體系，而且每一個邊陲國家和半邊陲國家都是有其機會成為核心國家。而東亞雁行模式是局限在東亞國家，如日本、台灣、韓國與大陸等東亞的國家，彼此相互的扶持與競爭，每一個國家在其特定的產業裡都是有機會成為雁首的，但是也因各個國家經濟情勢衰退而變成雁群裡的雁尾。本節將介紹其世界體系理論與雁行模式的論旨與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關連性，試著分析如下：

壹、世界體系理論/雁行模式論旨

一、世界體系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是 1970 年代由華勒斯坦提出來的。他用體系觀點來分析整個世界及其組成部分的發展與變化。它不像現代化理論只注

重單一國家的現代化，也不像依賴理論那樣將世界簡單地劃分為核心國與邊陲國。世界體系理論受到當時的結構主義的影響，將各國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解釋為世界體系中的國際分工。他將世界體系分成三個不同層次，就是核心國家、邊陲國家與半邊陲國家。核心國家是世界體系中站在主導的地位，可以控制和支配其他國家；邊陲國家是受核心國家控制和支配的國家；半邊陲國家則是介於二者之間，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邊陲國家，又在某種程度上受核心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依華勒斯坦的觀點，任何地區或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無法跳脫世界體系的制約，但是世界體系的範疇內，核心、邊陲與半邊陲的地位是可以變動的，可以上下流動的。

世界體系理論最主要的特點在於他的整個分析單位是世界體系而非個別單一的國家。華勒斯坦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不是一個自足的社會體系。每一個國家都不是相互分隔的社會，而是整個體系的一部分，是組成世界體系的一個單元。⁶¹

按照華勒斯坦解釋世界體系，形成世界體系有三種趨勢。第一個趨勢為世界農業資本主義化。16世紀前後，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推動下，西北歐範圍的世界體系逐步向外擴張。隨著世界的變化，土地的有效利用更為重要，因此小規模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逐漸消失，產生了大批僱用工人以及城市。第二個趨勢為科技發展。科技發展使人們更有效地開發利用資源，增加生產商品的能力，工業化更能擴張。第三個趨勢是組織結構的強化。國家組織、經濟結構甚至是文化制度對個人及國家的影響更加擴大。這三種趨勢可讓世界體系更加的鞏固。⁶²

⁶¹馬福雲，《發展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96。

⁶²同註1，頁314-316。

華勒斯坦又說世界體系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具有單一的多元文化和勞動分工。整個來說，世界體系並不是因為它包括整個世界，而是因為它比任何法律形成定義的政治單位都要大。這裡所指的政治單位主要是指 16 世紀以前的帝國、城市國家以及民族國家。⁶³

世界體系理論的建立在於依賴理論之後，所以世界體系理論深受依賴理論的影響，接受依賴理論的核心與邊陲及不平等交換等概念，但也修正了依賴理論的缺點，發展出新的理論概念。與依賴理論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於華勒斯坦提出了半邊陲的概念。依賴理論的核心與邊陲結構被批評為二分法，而且依賴理論對這種結構的解釋；形成這種結構之後，核心國和邊陲國之間的剝削和依賴等關係會一直持續存在，除非突破這個格局，是一種靜態的分析模式，不能解釋變遷中的各種社會。世界體系理論因此提出半邊陲的概念來彌補依賴理論的缺點。在核心與邊陲的結構中加入半邊陲，他們能夠在世界體系內上下流動，使這個結構從靜態變成動態。

世界體系理論也受到當時結構主義的影響。在解釋非西方開發中國家的低度發展之原因時，如果現代化理論是犯了「內部決定論」，將落後原因指向國內因素，依賴理論便是犯了「外部決定論」，將落後原因歸咎於核心國家的剝削和控制所造成，可是世界體系理論卻犯了「結構決定論」，認為世界體系中的各個角色是經過區域分工自然產生的，而且世界體系本身有其整體的發展規律。一個國家的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變化並不僅是其本身努力所能夠決定的，而是結構因素所影響的。

世界體系理論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視為一個整體，研究其總

⁶³王正毅，《世界體系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72。

體的發展規律，⁶⁴不過在整體的研究過程中，忽略了組成世界體系的各個社會和國家之重要性。個別的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成為被決定的東西，沒有自己可以發揮的空間。而且，世界體系理論沒有為開發中國家提供一個可參考的發展道路，它只有分析體系中存在的結構和作用，關於開發中國家如何達到發展並沒有完全的討論。

二、雁行形態模式

「雁行模式」是在說明一個國家中特定產業依序興盛衰退的過程。有學者研究戰後亞洲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及產業結構變遷之現象，認為亞洲國家雁行模式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日本為雁首，其次為東亞國家如：南韓、台灣、香港等，接續其後的是中國大陸等國家。也就是說日本先發展西方國家將喪失競爭力的產品，當日本發展到技術成熟，加上生產要素也產生變化時，這些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開始轉弱。接著東亞經濟發展國家，包括台灣、韓國等，藉自日本移轉技術或自行開發，開始生產這些產品。同樣地，當東亞新興國家發展成熟後，這些產品又移至更為低度的國家發展。在此同時，日本產業升級到另一個新的層次，東亞國家生產的層次也相對升級，呈現出很有秩序發展，這就是雁行模式。

原創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依據日本工業化的經驗，於1930年代逐漸醞釀其雁行模式，完整的輪廓則出版在他1962年所寫的論文。而赤松要最早是針對日本機械工業與紡織業的貿易資料作為分析，指出雁行模式的發展階段、過程與結構，企圖以此推論解釋日本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

⁶⁴同註 50，頁 104。

赤松要以日本的紡織產業在發展初期，成功的進行進口替代的經驗為基礎，將其歸納為以下概念：若以時間為面向畫出進出口數量與產量的變化，就可以發現進口量、國內生產量、出口量，依此順序上升下降，形成一雁行模式。即一落後國家在引進一新產品時，先是自國外進口，然後國內開始生產，當生產量逐漸增加時，進口則逐漸減少，當生產量增至一定規模後就可以開始出口。⁶⁵此一產業的依循模式且循環開來，我們亦將此一概念稱為雁行產業模式。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亞國家首先發展最快為雁首的是日本，日本後面緊接著台灣、韓國等，然後再跟著是中國大陸等國家，如此一來每一國家產業皆順利升級和轉型。此發展階段的重點是日本居於領先地位，日本不但不擔心台灣和韓國等緊迫在後，而且會因為台灣和韓國等發展愈好，需更多日本零件和原料，創造更多日本的貿易順差。這個模式主宰了日本產業界對於產業發展模式的思維。⁶⁶

「雁行模式」對東亞整體而言，長期以來，日本在東亞地區是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分工體系」，並在此形成了東亞雁行模式。這種模式以日本為領頭雁，亞洲 NIES⁶⁷為雁身，ASEAN⁶⁸及中國為雁尾的經濟發展模式。⁶⁹

依據這種模式，日本作為領頭雁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並

⁶⁵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民 92，頁 195。

⁶⁶ 朱雲鵬、林美萱。2002。〈雁行理論是否仍適用於東亞發展〉。《國家政策論壇》，第 2 卷第 3 期，頁 162-170。

⁶⁷ 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指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等亞洲四小龍。

⁶⁸ 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指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

⁶⁹ 從現有資料來看所謂“雁行模式”的得名有兩種，一是雁行發展圖類似雁行，與之相適應的主要是說明一國產業為獲得更快的發展而選擇的發展途徑；另一種是在貿易過程當中以日本為“雁頭”，亞洲 NIES 為“雁身”，ASEAN 及中國為“雁尾”。這種貿易模式類似雁行，與之相適應的是一個地區如何利用這種模式獲得發展，但就其實質而言是一致的。本文主要論述的是後一種。

依次把本國處於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家電等產業透過貿易、技術轉移依次傳遞給亞洲四小龍和東協國家及中國沿海地區，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具有了大量出口的能力。事實上，作為亞洲唯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早在 1950 年代中期經濟獲得恢復以後，就一直依據「雁行模式」來規劃東亞地區的經濟分工。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以來，日本一直將東亞地區視為其經濟起飛的最重要的海外市場。從日本和東亞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情況看，所經歷的產業架構的調整、轉移，基本上是與雁行分工模式相吻合的。

貳、從世界體系/雁行模式看台灣發展經驗

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觀察台灣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以「雁行形態的經濟發展」形態來說明在價值流動與市場法則的作用下，台灣與其他亞洲區域內國家共生共榮的機制。日本位居雁首的位置，從事著簡單和勞力密集的加工業，在早期，則到亞洲四小龍委託加工或直接投資生產。台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等四國一方面藉著維持與繼續此種生產分工的關係，強化出口貿易累積外匯，另一方面也積極的推動國內工業化的升級，提高差異化的競爭力。當四小龍陸續擺脫生產因素導向階段，連同日本，已需將低技術產業直接投資向東協國家，如此形成一個分工鏈。無論帶頭的是日本或是其他在東協的國家，都在這種緊密的合作關係下，各自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成長與發展。整個亞洲地區展現出一種強勁有力的氣息。

在這個過程中，外人直接投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亞洲地區，以日本為雁首，亞洲四小龍、中國等處於各種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並存，從發展階段高的國家和地區，向發展階段較低的國家和地

區直接投資的趨勢。此一趨勢提高了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並導致雙方的成長，以及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接受投資的國家和地區，透過直接投資，吸收過剩的勞力，累積其所缺乏的資本、技術和經營方式，從而加快了趕超先進國家的步伐。

在 1970 年到 1990 年間，在亞洲地區雁形型態的分工經濟體系下，台灣亦利用電子供應鏈的作業能力，提升了台灣資訊產業的競爭力，也創造出經濟亮麗的佳績，有機會成為世界體系理論中的核心國地位，甚至在此一時期，台灣經濟發展亦利用了電子產業鏈，跳升到雁行模式中的雁首的位置，國民年平均所得已達一萬美元之高，台灣經濟發展成就獲致國際間相當的肯定。



